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向度及提升路径

曹清燕, 张蓓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既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持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基于“还原论”, 作为人类交往及发展的现实表达和理想构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一种政策信息, 也是一种价值观念, 还是一种行动框架。这就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应是多向度的: 政策信息传播向度的信息传递、价值观念传播向度的价值传通、行动框架传播向度的行为传动。当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传而不知、传而不通、传而不动的现实困境。基于此, 在信息传递方面, 应由官方叙事转向多元叙事; 在价值传通方面, 应由单向宣传转向交互融通; 在行为传动方面, 应由自我主导转向共同创造, 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精准传播。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国际传播; 信息传递; 价值传通; 行为传动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3)06-0137-11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并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作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意蕴和构建路径的总体理论和观念, 其国际传播既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持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当前, 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模糊认识和困惑心态”^[2], 存在“污名化”^[3]、“歪曲和抹黑”^[4]等情况。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有效性亟待提升。探讨如何更深入地向国际社会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进一步凝聚和增进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成了当下十分紧要的课题。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综述

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认同的不足, 学者们就如何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有效性, 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进路。

一是采取“冲击—反应”的研究进路。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面临的外部困境提出应对之策。刘英杰和徐菲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遭到西方的误解和阻击, 应推动中西方对话, 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5]; 金天栋和任晓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面临意识形态沟壑和战略竞争壁垒, 应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以解决传播难题^[6]; 陈兰英和李琳指

收稿日期: 2022-12-29; 修回日期: 2023-07-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在华留学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研究”(20BKS184);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文化认同研究”(CX20220143);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学生中的价值认同及推广研究”(22LH0102)

作者简介: 曹清燕, 女, 河南南阳人, 法学博士,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与实践; 张蓓, 女, 安徽宣城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联系邮箱: zbei05@126.com

出,要认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五重斗争对象,把握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策略^[7]。

二是采取“反思—改善”的研究进路。学者们反思了中国向国际社会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缺陷并对此进行了建设性的思考。蔡文成和牟琛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面临中国国际话语权与话语体系薄弱的困境,并提出了话语建构的策略^[8];金伟和刘攀指出,国际传播理论缺乏、主动设置议题能力弱和国际话语体系建构不完善等因素制约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的效果,应据此加强综合施策^[9]。

三是采取“比照—补充”的研究进路。部分学者采用传播学的研究框架,从国际传播的主体要素、内容要素、评价要素等方面比照和直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现状。就主体而言,梅朝阳和孙元涛认为,我国官方对外新闻媒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主阵地,应合理划分媒介生态位,构建差异化的媒介种群以防止和减少竞争置换和竞争排斥^[10]。在内容方面,李克和朱虹宇指出,情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过程中重要且隐蔽的因素,应深刻认识国际受众的情感状态,调用共情资源,采用共情修辞进行传播^[11]。就评价而言,王锡苓和谢诗琦注意到了传播评价的重要性,提出了构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评价体系的建议^[12]。

“冲击—反应”“反思—改善”和“比照—补充”的研究进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提供了研究视角。但是,这三种研究进路的相关成果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或视为“中国方案”,或视为“中国议题”,或视为“中国话语”,或视为“国际规范”,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整体化理解。这种整体化理解既缺少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内涵的前置性关照,也遮蔽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活动的独特性,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成了一种较为泛化的传播活动,阻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有效性的实现。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实践的首要前提。本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复杂意义光谱出发,基于“还原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分解式的考察和审视,以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政策信息、价值观念和行动框架的实质。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分解—提升”的研究进路,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应有的向度和特点并确定相应的策略,以提升其国际传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进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空间。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三重向度

在国际传播视域下,首先要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什么”而传播的前提性问题。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相关论述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已有实践,基于“还原论”解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和性质会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是立体、多维度的:既是一种政策信息,也是一种价值观念,还是一种行动框架。因此,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政策信息”“价值观念”“行动框架”来传播,进行政策信息传播向度的信息传递、价值观念传播向度的价值传递及行动框架传播向度的行为传递。

(一) 政策信息传播向度的信息传递

自2012年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历经了一般性阐释到大国外交新理念的演化过程,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然性描述升级为“构建(打造、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然性主张,在领导人外交、官方论坛对话、高层磋商等重要外交场合不断出场,成为我国重大外交活动的话语旗帜。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13];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中

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主张和政策精髓。

在学界,学者们也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理解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如美国杰普曼大学传播系终身教授贾文山就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已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14]。可见,作为中国官方推崇的外交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的政策属性。对于拥有多元文化和多样文明背景的国际受众而言,这一理念是中国的政策性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概念、新表述和新主张,若想获得全球话语空间和实践空间,必然以扩散和抵达国际社会思想场域、吸引国际社会官方和民间的关注为前提条件。如是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首要向度便是政策信息传播向度的信息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信息传递是“创新的扩散”,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新颖政策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使“个人(或其他决策单位)了解到某项创新的存在并对它的功能有所认识”^[15],吸引国际受众关注、知晓、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了解和兴趣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信息传递是中国向国际受众传送和叙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单向输出过程,可通过信号释放、信息告知、话语宣传和议题倡导等方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概念意涵、基本立场和核心主张进行“大量撒播”,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相关信息在国际社会“漫游”,流向并传达给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知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存在,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张有所认识。

(二) 价值观念传播向度的价值传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了新的全球发展观、国际交往观和共同价值观,体现了价值追求、价值准则和价值基础的统一,是基于国家利益而

又超越国家利益的价值观念叙事。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了全球共同发展的价值追求。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16](537)}的重大命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促进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以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17],提倡“把人类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对待,追求和维护人类的独立利益,从理念和制度上整体性审视和应对当代人面临的关乎安全、生态与发展的问題”^[18],倡导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去中心化发展体系的价值追求。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了国际交往的价值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超越‘均势’和‘霸权’两种国际秩序观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国际秩序观”^[19]。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准则下,国际关系不再是一种影响与被影响、中心与边缘、主导与对抗的关系,而是呈现出各个国家和谐共生的状态,各个国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遵循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正确义利观,建构全球化时代国际交往的新价值范式。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坚持和弘扬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价值观,又实现了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叙事既是对不合理的旧的价值观念的理论批判,也是对新的价值观念的实践建构。

作为“价值观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国际传播必须进行价值观念传播向度的价值传通。价值传通具体表现为国际受众赞成、支持和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观念叙事,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深度的精神融通,将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零散和模糊认知凝结为自己的思想信念和价值信仰,从而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筑的价值理想、道德境域和信仰空间。与政策信息传播向度的信息传递不同,

价值传通需要以传播受众为面向,通过多元对话、意见交换等方式,保障传播者与传播受众的双向沟通,并在这种双向沟通的过程中进行持续的价值叙事,以达到价值感召、价值协商和价值相融的效果,从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国际受众的说服。国际受众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体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意蕴: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逐渐转变为主动的价值构建者,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领会阶段”。

(三) 行动框架传播向度的行为传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止于理念层面,它指向社会现实,并积极介入社会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说明了如何建设这个世界,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及国家层面指出了多层次、立体化的行动方向。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讲话中指出,通过“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五个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再次倡议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和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16](541)],坚持和加强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绿色低碳,进一步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举措。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以上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作为行动框架的意义层次——以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五个方面的共同行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一带一路”倡议具化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构思,提供了区域间和国家间的合作平台。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和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举办“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等方式,促使中国与多个国家战略规划的达成,为新型国际多边合作

提供了行动平台和实践路径,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行动框架的重要呈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建构及世界和平愿景的实现订制了行动框架,作为“国际关系话语或战略的主要制度化展现或策略举措”^[20]获得了广泛的实践意义和行动空间。作为“行动框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意义在于:影响国际社会多元主体的行为选择,动员国际社会在伙伴关系建立、安全规划、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行动框架内积极行动,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广泛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行为传动具有两条行动路线:其一,国际社会多元主体基于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行动路线的认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框架内参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者;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先行者和受益者通过行为示范和导引,带动观望者、迟疑者和等待者,吸引更多的国际受众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助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形成,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行动框架传播向度的行为传动,需要依据其“可观察”和“易介入”的特点,采用商业活动、项目合作、人文交流等国际传播方式,使国际社会的多元主体能够更加方便地参与其中并切实地获取效益。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受众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付诸行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始于“信息传递”,而“价值传通”既升华了“信息传递”,也催生和促发了“行为传动”,这三重向度在总体上呈现为渐次递进的历时性逻辑。“信息传递”“价值传通”和“行为传动”三者间除了拥有历时性逻辑之外,还存在交叉关系。国际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有助于体认其价值意蕴,而先行者的示范效应则能够促进理念的再传播,使更多的国际受众关注、知晓并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此,“行为传动”既能够进一

步促进“价值传通”,也能够进一步扩大“信息传递”。至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政策信息、价值观念和行动框架的意义光谱,铺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信息传递”“价值传通”“行为传通”的三重向度,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整的国际传播过程。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现实困境

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不断推进,但是政策信息传播向度的“传而不知”、价值观念传播向度的“传而不通”及行动框架传播向度的“传而不动”现象仍然存在。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存在现实困境。

(一) 政策信息传播向度的“传而不知”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外交场合提出大国外交理念以来,政界和学界开始逐步关注和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范围的扩大,这一理念引起了国际政界和学界更加广泛的反应。但在实践中,作为政策信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未全面地流向和传播给国际社会,也并未准确真实地抵达国际受众的思想场域,在信息传递方面仍然存在着“传而不知”的现象。

一方面,存在部分国际受众从未听说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情况。在华留学生具有多种语言优势和跨文化生活优势,兼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主体和国际传播对象的双重属性,是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接受情况的关键群体。笔者所在课题组在2022年通过对184名在华留学生的问卷调研发现,超过80%的在华留学生表示从未听说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表达。

另一方面,也存在部分国际受众不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主张和核心立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认知困惑的情况。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张登华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概

念模糊的空洞口号,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指向意义不明,致使其他国家难以进行战略预判和采取相应的战略行动^[21]。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要实践平台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同样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和泛化的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模糊、宽泛而灵活”^[22];“过于宽泛和模糊,不足以构成一个可操作的路线图”^[23];“与其说是一个行动蓝图,不如说是一个具有众多目标的全面愿景”^[24]。还有学者指出,由于“一带一路”具有内在的模糊性,其他参与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和利益阐释其含义,于是“一带一路”成了一个在权力和利益争夺中展开的松散政策^[2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的“传而不知”,既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信息传递以官方为主,缺乏面向非政府组织、各类民间团体等普通大众的广泛传播,也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信息传递以政治宣传的宏大叙事居多,未能处理好我们“想讲的”和受众“想听的”之间的关系,缺乏对其内涵和要义的具体叙事。

(二) 价值观念传播向度的“传而不通”

面对全球多元化政治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遭遇了被排斥、贬损乃至歪曲和污名化的价值消解过程,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国际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敌对性的想象和解读。西方学者通过普遍流行的国际政治关系来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立场来消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合法性。新现实主义从“权力”视角对其进行解读,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有序理性”和“天下体系”^[26],体现了中国拓展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意图。“一带一路”是“霸权式的东方马歇尔计划”^[27],是“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战略努力”^[28],试图通过建设陆海基础设施,将亚洲、欧洲和非洲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网络,以“重塑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关系”^[29]。新现实主义则从“利益”视角进行解读,认为“一带一路”是中

国的内部政策和战略,其提出既是为了解决钢铁、水泥和建筑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也是为了实现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的目的^[30]。有学者指出,“像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将继续寻求维护其核心利益,无论如何定义……一个自信的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物质利益扩张的结果,中国在寻求全球合法性的过程中转向了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31]。这些论述都想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实践,是中国出于对现实利益和核心利益的寻求。

第二,国际媒体的负向议题设置和转化报道。学者通过对西方媒体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报道进行分析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面报道较少,“态度总体上是负面的、否定的”^[32];德国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虽然处于深入报道阶段,但是负面声音不断^[33]。基于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合谋关系以及媒体对大众舆论的影响力,一些国家的媒体通过负向议题的设置和传播,建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负面的意见环境和言论生态。另外,一些国际媒体善于通过话语转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曲解。例如,《经济学家》有文章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主导的)欧亚大陆成为与(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区域相抗衡的经济和贸易区域,通过“中国主导”和“美国主导”的划分否定了中国去属地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7],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一带一路”倡议在话语转换和再诠释的过程中遭遇价值消解。

第三,国际民众的支持率不高。《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20》显示,发达国家受访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个人具有积极意义的占比是40%,对国家具有积极意义的占比为41%,对全球治理具有积极意义的占比是44%^[34]。由此可见,国际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认同度不高。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而不通”的表现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受新现实主义和新

自由主义等学术话语范式的挤压,被赋予了极强的意识形态性和对抗性。而国际话语权“西强东弱”的基本格局也导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传播过程中被屏蔽、扭曲和抹黑,影响了国际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判断和认同。

(三) 行动框架传播向度的“传而不动”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也是践行者。在中国的推动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于2017年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虽然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存在一定的合意空间,但是多元的国际社会成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还任重道远。

一方面,当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以中国为主,部分国家和地区或是被动参与,或是抱持观望态度。中国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刺激和促进了全球多个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往来、产业升级、减贫事业以及卫生事业等方面的发展。在抗击疫情这一关涉人类共同命运的议题上,中国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化人道主义行动,同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分享了疫情防控和诊疗的方案,向34个国家派出了38支医疗专家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2亿剂疫苗,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和决心。然而,全球抗疫过程中出现的病毒溯源政治化、哄抢医疗资源、“疫苗国家主义”等状况,不仅加剧了中西方国家间的博弈形势,还使部分国家的国家本位行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渐行渐远。

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为对现有价值体系的威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采取战略性排斥措施。虽然2017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但是个别国家自2019年起连续3年坚持要求对决议含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段落进行分段表决,企图阻止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35]。此外,美国进一步加强与各区域盟友的合作,并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干涉。2021年6月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中提出,“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简称 B3W)项目, 以美国主要伙伴国家为集合的西方国家宣称, 将在中国的“一带一路”之外,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另一种选择”, 企图对抗、制衡和取代“一带一路”倡议。2022年6月, G7会议宣称正式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计划, G7国家将一起筹集数千亿美元用于全球基础设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 再次对抗“一带一路”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既服务国际社会又需全球参与的理念, 在国际社会传而不动有着极其现实的因素。部分经济落后的国家成了国际传播中的“知沟”国家, 不能有效获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相关信息, 缺乏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潜在利益和参与方式的认知。部分国家由于国家利益殊异、意识形态偏见裹挟等缘由, 难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和再传播者。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扩大之策

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传而不知”“传而不通”和“传而不动”的现实困境, 需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三重向度进行实践上的扩大。在信息传递方面, 需要从官方叙事向多元叙事转向; 在价值传通方面, 需要从单向宣传向交互融通转向; 在行为传动方面, 需要从自我主导向共同创造转向, 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效果。

(一) 信息传递由官方叙事转向多元叙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中存在的“传而不知”现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叙事体系密切相关。当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要出现在国家领导人演讲、主场外交、官方论坛对话、官方媒体平台以及党报党刊的报道宣传中, 并且主要出现在基于政治主张的宏大主题中, 形成了以官方媒体为主要叙事主体, 以宏大主题、政治宣传为主要叙事内容, 以官方媒介传

播为主要叙事方式的官方叙事体系。官方叙事体系虽然具有权威性高和公信力强的传播优势, 但官方叙事体系容易使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社会普通民众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作远离生活的政治话语, 难以广泛且有效地抵达民众内心。因此,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要在官方叙事到多元叙事的转向中扩大信息传递。

第一, 在叙事对象上注重多元性。“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 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36]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国家和个人在内的多方主体参与, 因而该理念国际传播的受众是丰富的, 既应面向国家、国际机构、跨国组织等政治性平台传播, 也需要面向团体和个人的大众传播。在继续发挥官方叙事主体面向国家、国际机构、跨国组织的政治性传播之外, 还要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大众传播的重点人群。在国际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学者、智库研究人员, 在社交媒介拥有广泛号召力的社会活动家和舆论领袖, 具有多重身份和跨文化生活经历的国际留学生群体等人群都能够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再传播。因而, 要重视和发挥专家学者、智库研究人员、社会活动家、网络舆论领袖、国际留学生群体等受众的信息传递作用, 面向以上重点群体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主张、世界意义、构建路径等信息, 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辐射更广泛的大众人群。

第二, 叙事内容上聚焦具体线索。既要在促进人类发展前途命运的宏大叙事中阐释清楚中国在疫情应对、国际减贫事业、经济全球化、气候变化、互联网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具体立场、主张和行动, 也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叙事回归个体, 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结合点, 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性概念转换成接地气、可感知的生活化表达, 如“一带一路”留学优惠政策、创新就业机会等, 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

第三,叙事方式上注重智能传播。智能传播在当下信息社会彰显了巨大的内容生产力和舆论引导力,要用好各类用户数量庞大、用户活跃度高的网络社交媒介,让中外普通民众成为“中国故事讲述者”和“中国国家形象代言人”,以全球50亿网民的社交传播量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信息传递的覆盖面。同时,也要通过音频、图画、视频在内的视觉化呈现以及算法传播等现代科技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面向国际受众的吸引力和精准性。

(二) 价值传通由单向宣传转向交互融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过程是传播主体叙事和传播受众接受的同一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传通与否在于国际受众对中国的这一价值观念接不接受、认不认可,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传通具有“中国立场、他者面向”的特点。进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传通,需要平衡“讲者”和“听者”的关系,在解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何与国际传播对象建立有效连接”的问题中实现。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实践明显呈现出“中国视角、中式表达”的单向宣传特点。因为未能处理好我们“想讲的”和受众“想听的”之间的关系,所以没有与国际受众建立起切近而有效的连接。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在价值传通向度要实现由单向宣传到交互融通的转向。

第一,树立交互融通的国际传播取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对作为传播主体的中国而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叙事过程;而对作为传播受众的国际社会而言,则是新概念文本的阅读过程。要将中国的“叙事过程”与国际社会的“阅读过程”关联起来,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表达既符合国际受众的话语方式,又体现中国观念的话语特色,让国际受众真切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其自身文化背景和价值信仰的融通以及与众不同之处。在中国“叙事过程”与国际受众“阅读过程”

的对接交互过程中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感召力和价值吸引力。

第二,加强受众思维和分众研究。由于“到达国际读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落脚点,所以要了解国际受众、贴近国际受众以提高国际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接受率。

“没有谁能够掌握讲演的艺术……除非他能列举出听众的特征,并根据其类别来区分他要讲的所有内容。”^[37]因此,要研究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及其对华战略目标与侧重点的分化,研究国际受众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的异质性,研究不同年龄受众媒介使用的偏好和接受信息的形式需求,以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分众传播设计。

第三,加强对话交流和意见交换。“信息符号化后,进行传播是会被‘他者’诠释与再理解的,之后可能通过‘他者’再符号化予以反馈。”^[6]因此,中国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不仅要了解国际社会受众的基础上开展,还要“让‘他者’来‘寻找’我们、‘影响’我们”^[38],通过双方的互动促进传播主体和受众间的价值沟通和价值协商。具体而言,中国应将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反馈进行再叙事,及时解决国际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的概念模糊、主张不清、目标不明等困惑;发现、收编以及整合国际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向认知,广泛弘扬和传播国际受众的正面评价;有力批驳和回击恶意歪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错误论调,“去污反黑”澄清负面议题。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才能够实现从单向的解读走向对话式的澄清,在双方的对话交流和意见交换中将价值相异转化为价值同构,实现最大限度的价值传通。

(三) 行为传动由自我主导转向共同创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元开放的共同发展空间,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民众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创造中才能真正实现。作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议者和先行者,中国目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的主导者,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也多以中国为主体视角。在当今双向传播甚至多向传播的时代,“明智的说服者理应与利益相关者成就共同的故事、‘戏剧’和集体记忆”^[39]。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要在自我主导到共同创造的转向中促进行为传动。

第一,传播明晰可行的路线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行动框架,还需要加强对具体合作项目、合作平台和合作方式的传播,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以方便介入、易于参与,让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合作、共同受益。如传播“一带一路”项目在基础设施、贸易往来、产业升级、技术发展、教育交流以及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具体合作路径,为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直接的参与途径和获益方式,扩大国际受众的参与度。

第二,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益者的故事。利益是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和认可该理念的最直接因素,要利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益者的故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提供不同立场、视角和经验,“通过将对内群体‘我’和外群体‘你’的感知转化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感知,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涵,建立不同国家叙事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的关系”^[40],发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示范效应,从而激发其他国家和地区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体性和行动力。

第三,加强人文交流传播。跨文化人文交流在促进人员往来、思想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拓展一种超越国家公民的共同身份感,创设国际民众的共同记忆并发展共同感情,提升国际民众之间的亲密感、同理心和认同感,产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动机。要创设接地气、惠民生的文化艺术、学术教育、志愿服务等人文交流活动,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社会民众在其中形成共同

的、积极的情感体验,加强彼此信任、相互依赖的感觉,促成对人类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共同价值寻求。

全面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政策信息、价值观念和行动框架的复杂意义光谱,在此基础上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三重向度,有助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面向国际社会多元主体的精准性和说服力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立场和中国价值观有力的理论表述,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当性和合法性的种种消解,是西方一系列“现代的”“普世的”价值观对中国价值观的反驳和抵抗,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倡导“多元共生”的价值观的生长空间,正在成为一个“游荡的幽灵”,为全球发展交往提供一种新的、普遍性的价值理论和价值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实践使命,需要更加深入地予以推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 宋婧琳, 张华波. 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综述[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7(5): 207.
- [3] 蔡文成. 西方学者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危害及其正确应对[J]. 理论探索, 2021(3): 55.
- [4] 王雪冬. 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几种论调及辨析[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 7(11): 89-97, 134.
- [5] 刘英杰, 徐菲.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国际传播的意识形态困境及应对[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11): 112-115.
- [6] 金天栋, 任晓.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共通的意义空间”研究[J]. 社会科学, 2021(2): 32-46.
- [7] 陈兰英, 李琳.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中的斗争艺术[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5(2): 150-153, 161.
- [8] 蔡文成, 牟琛.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传播困境及

- 突围策略[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24(4): 18-26, 134-135.
- [9] 金伟, 刘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探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4): 85-89.
- [10] 梅朝阳, 孙元涛. 中国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媒介生态思考[J]. 浙江社会科学, 2020(9): 78-87, 159.
- [11] 李克, 朱虹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共情修辞路径[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2): 88-96.
- [12] 王锡苓, 谢诗琦.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评价体系的构建[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2(7): 39-45.
- [1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EB/OL]. (2018-03-11) [2023-02-20]. http://www.gov.cn/xinwen/2018-03/11/content_5273222.htm.
- [14] JIA Wenshan.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ighlights interactional dynamics[EB/OL]. (2019-03-21) [2023-02-20]. <https://http://nads.ruc.edu.cn/xzgd/8bea942e8b174e028fe607f82d1c2dee.htm>.
- [15] 埃弗雷特·罗杰斯. 创新的扩散[M]. 唐兴通, 郑常青, 张廷臣,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146.
- [1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17] 刘同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7): 4-21, 204.
- [18] 蔡拓. 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比较分析[J]. 国际政治研究, 2018, 39(6): 9-24.
- [19] 徐艳玲, 李聪. “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的三重维度[J]. 科学社会主义, 2016(3): 108-113.
- [20] 郇庆治.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重要层面[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7(12): 13-20.
- [21] ZHANG Denghua.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China’s Diplomacy: Meaning, Motives and Implications[J].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2018, 5(2): 196-207.
- [22] TIM S. China’s “New Silk Roads”: sub-national regions and networks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s[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6, 37(9): 1628-1643.
- [23] TOM M. China’s asian dream quiet empire building along the New Silk Road[M]. London: ZED Books, 2017: 30.
- [24] JOHNSON C K. President Xi Jinping’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practical assess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oadmap for China’ Global Resurgence[R]. Washington: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6: 22.
- [25] JONES L, ZENG Jinghan.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yond “Grand Strategy” to a State Transformation Analysis[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9, 40(8): 1415-1439.
- [26] RUBEN G V.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China’s New Racial Sovereignty[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7, 59: 139-141.
- [27] RAOUL B, CHIH Y 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s Post-Western Regionalism: Rethink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Confucian Perspective[J]. Uluslararası İlişkiler, 2021, 18(70): 85-101.
- [28] TERRY 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sights from China’s Backyard[J].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2019, 13(3): 52-72.
- [29] SHATTUCK T J. How China dictates the rules of the game[EB/OL]. (2018-07-25) [2023-02-20].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18/07/how-china-dictates-the-rules-of-the-game/>.
- [30] CALLAHAN W A.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new Eurasian order[R]. Norway: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1.
- [31] STEPHEN N 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and the changing Asian ord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8, 73(3): 449-463.
- [32] 高金萍, 余悦. 美国媒体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呈现[J]. 新闻爱好者, 2020(3): 15-18.
- [33] 许涌斌, 高金萍. 德国媒体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语料库辅助的批评话语分析[J]. 德国研究, 2020, 35(4): 151-167, 191.
- [34]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20》核心发现[EB/OL]. (2021-12-30) [2023-02-20]. <https://mp.weixin.qq.com/s/SHglxvU9Ok8Dk50nik81Q>.
- [35] 中国代表就个别国家阻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大一委决议阐明中方立场[EB/OL]. (2021-11-02) [2023-02-20].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1/11-02/9599885.shtml>.
- [36]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29.
- [37]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 对空言说: 传播的观念史[M]. 邓建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67.
- [38] 戴维·莫利. 传媒、现代性和科技: “新”的地理学[M]. 郭大为, 常怡如, 徐春昕,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

- 版社, 2009: 183.
- [39] 胡百精. 说服与认同[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104.
- [40] 赵欣. 国际传播视野中的中国故事叙事之道——“第一主讲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涵的国际分享[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 28(1): 5-25, 126.

Three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ts promotion

CAO Qingyan, ZHANG Bei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ot only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ut is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reductionism" perspective,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as a realistic expression and idealistic framework for human intera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not only a form of policy information, a set of values, but also an action framework. This determin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hould be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the dimension of disseminating policy information, value communication in the dimension of disseminating values, and behavioral transmission in the dimension of disseminating action frameworks. Currently, there are realistic dilemmas in three dimensions of dissemination, that is, being transmitted without being known, without being understood, and without being implemented. Therefore,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ere should be a shift from official narratives to diverse narratives; in terms of value communication, there should be a shift from one-way propaganda to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in terms of behavioral transmission, there should be a shift from self-guidance to joint creation so as to advance the precis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value communication; behavioral propulsion

[编辑: 游玉佩]